

● 古代文学

清代的“词史”意识

陈 水 云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水云(1964-),男,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清代词学研究。

摘 要]“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关键词] 以词存史;以史入词;以词纪事;心态史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5-0614-07

“诗史”是宋代诗学中的一个理论范畴,“词史”是清代在传统诗学启发下提出的一个词学话语。诗学中的“诗史”说已经成为当前诗学研究的热点^①,而词学中的“词史”说却只在论述周济词学时才偶有涉及,连最近出版的《中国词学大辞典》都未将之作为专门术语单独介绍,这和清代创作中大量的以词存史、以史入词、以“词史”品词的现象极不相符。近年来,有论者已开始注意到清初词学中的“词史”意识,把清代“词史”说提出的时间由嘉庆末年上推到康熙初年,这是关于清代“词史”说研究的一大进步^②,遗憾的是对清初词学的这种“词史”意识未能展开充分的论述,笔者试图在有关论述的基础上^③,进一步梳理清代词学中的有关“词史”意识,揭示其意蕴,分析其成因。

—

清代的“词史”意识,首先表现在词话词选的编纂上。词话中“词史”意识的表现,是指有些词话记录了词的本事,保存了专集中未曾收录的词作与词人资料,读者据此可以了解作者创作的背景,推测作者的书写意图。词选中“词史”意识的表现,是指编选者通过辑录和评论词作与编辑词人传记材料,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如实地反映着社会人情世态,具有“以词存史”或“以词观史”的积极意义。

清代词话和以前的诗话一样,经历了一个记述古今词人轶事,到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过程。这里所说的具有“词史”意识的词话,主要是指那些记录作者创作本事的词话,因为它比较具体地介绍了作者写作的目的、时间、地点及传播情况,便于读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作者的书写意图和历代传播接受的情形。尤侗《词苑丛谈序》说:

词之见于话者,如后主之“小楼昨夜”,冯延巳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红杏枝头”,子野之“云破月来”,东坡之“大江东去”,耆卿之“晓风残月”,少游之“山抹微云”……皆其脍炙齿牙者,风流相扇,不乏美谈,顾未有人集其成耳。……(徐钊)今复辑成《词苑丛谈》一书,盖撮前人之标

而搜新剔异,更有闻所未闻者,洵倚声之董狐矣!殆与《本事诗》相为表里,予故重为之序。夫古人有“诗史”之说,诗之有话,犹史之有传也。诗既有史,词独无史乎哉?^[1](第1页)

尤侗认为词话中的本事,有如史书的人物传记,词话也就有似于史书,记录了作者的创作背景和作品的接受情况,对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尤侗所说的那样,徐钊《词苑丛谈》一书,的确有着以词存史的意义,书中卷六到卷九大量地记录了从唐宋到明末清初词的创作背景,让今天的研究者很清晰地了解到作者的书写意图,特别是他所撰写的《南州草堂词话》一书,更是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明末清初作者的创作史料,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清初词学的重要文献。在《词苑丛谈》的影响下,当时的词话记录词本事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如沈雄的《古今词话》、王奕清的《历代词话》、冯金伯的《词苑萃编》、张宗楠的《词林纪事》都体现了这种“以词存史”的词史意识。不过,今天的研究者更注重它们的理论价值,在我看来,它们在保存词的文献和搜集词的评论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相对词话而言,词选中的“词史”意识更为浓厚,词话中的“词史”是指它保存了作品写作的背景材料,而词选中的“词史”则是指它保存了大量的词作和有关的词评。词选中的“词史”意识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当时出版了两部著名的词选,一部是《复雅歌辞》,一部是《乐府雅词》。前者所选作品“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卷内载词话本事,卷末附音律宫调,表征出保存一代文献的编选意图。后者在选词及词人的数量上不及前者,但集中地展现了南宋以前曲子词创作的总体风貌。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为大晟乐之遗音,卷末附录之词为“平日脍炙人口,咸不知姓名”者,朱彝尊揭示其意图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2](卷40),正说明该词选是要保存不见经传的非主流文化。其后,元好问的《中州乐府》、黄旸的《花庵词选》把这种潜在的“词史”意识,转化为明确的以词存史的编选意图,有意识地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与庄严的“信史”联系在一起。《中州乐府》的显著特征是诗词并录,同为证史;后者的重要标志是以传隶词,词以人存;从有关的词选编纂情况看,词学中的“词史”意识在南宋时期已基本成熟,只是还未曾有人将其明确揭示出来,直到清初才为人们所重视,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的理论见解。

明确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的是陈维崧,他在康熙十年(1671)和吴本嵩、吴逢原、潘眉合作编纂了一部大型“当代”词选——《今词苑》。他在《今词苑序》中说:“嗟乎!鸿都价贱,甲帐书亡,空读西晋之阳秋,莫问萧梁之文武。文章流极,巧历难推,即如词之一道,而余分闳位,所在成编,义例凡将,阙如不作,仅效漆园马非马之谈,遑恤宣尼觚不觚之叹,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则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3](卷2)指出他编纂《今词苑》的宗旨,就是要起到存经存史的作用,让词承担“经”“史”一样的责任。“经”在古代是指封建社会里的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典籍记载着西周时期的社会习俗、审美思想和典章制度,肩负着记载人类活动踪迹和传播人类文明的使命,故前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其中《诗》和其它文化典籍一样是记载人类活动踪迹的。《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说的是,《诗》的记言记事的功能为《春秋》所承担,这也就是表明《诗》在《春秋》出现之前是担当着后来《春秋》的角色的。钱谦益解释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4](卷18)尽管后来“诗”“史”分工,前者言情,后者记事,前者叙述人的心态史,后者记录人的行为史,但它们记载人类活动踪迹的功能是相同的。陈维崧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实际上就是强调“词”和“经”“史”一样记载人的行为和心态,有着保存一代文献典章制度的功用。

在清代编词选的风气相当浓厚,每一词派有自己的倡和结集之篇,如云间派的《倡和诗余》、《支机集》,广陵词坛的《红桥倡和》,曹尔堪、宋琬、王士禄的《江村倡和》及南北词坛的《秋水轩倡和》;不少地域性创作群体也有意识地从事结集汇编工作,有《柳洲词选》、《西陵词选》、《松陵词选》、《荆溪词初集》、《国朝常州词录》等等;它们采取以词系人的方式展现一时一地的“文采风流”,顾有孝为《松陵词选》作序称:“是编既成,采风渐广,十五国大观,予将拭目以待”。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编辑“当代”词选,实际是想像当年孔子编选《诗经·国风》一样,让君王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起到“可以观”的社会效果,这就将“以词

存史”转化为“以词观史”。“以词存史”的观念更表现在清代编纂的大量古今词选上,当时著名的词选有《词综》、《倚声初集》、《古今词汇》,这些词选直接沿袭宋金时期词选的体例,或以传隶词,词以人存;或卷前系以词人爵里,卷内存以词人词作;起着保存“一代文献”的重要意义。如朱彝尊的《词综》就体现了“以词存史”的观念,该书凡 36 卷,收唐、五代、宋、金、元词 2 252 首,词人 659 家。尽管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声明自己编选的宗旨是宗奉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准则,但他在实际编纂的过程中还是遵循着以词存史的体例,按照作者年代的先后编排作品次序,选取有关逸闻、本事及往哲评语附录其后,这对于后代的读者来说无疑有着以词存史或以词观史的积极意义。因为自明代中叶以来唐宋词籍大量失传,人们对唐宋词的了解仅仅依赖《花间》、《草堂》二书,对唐宋词的发展进程认识不清,《词综》的编纂刻印澄清了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朱彝尊“以词存史”的传统为后继者所继承,如王昶、黄燮清、丁绍仪编纂的历朝词综:《明词综》、《国朝词综》、《国朝词综二集》、《国朝词综续编》、《国朝词综补》,都是遵循朱彝尊《词综》的编选体例,所选词人各系以小传,间附词话、笔记诸评语,以体现“一代之词亦有不可尽废”的宗旨^[5](卷 41)。

二

清代的“词史”意识,还表现在创作方面。它开拓出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新境界,超越了明末词人单纯写情咏景的传统题材,“诸如……与国家民族利益息息相关的时政大事,以及故国之痛、民生疾苦、天灾人祸、战争动乱、洋人入侵、贬谪充军、贫富不均、科举考试、黄河决堤、壮丽山河、天上仙境、民族风情、历史人物、历史陈迹、题画咏物、胸中块垒等等,以及日常生活细致、天伦之乐、友情情谊、两地相思等都有反映”^[6](第 7 页)。其中最具有“词史”意味的还是那些以史入词,或以词纪事,或以词咏叹时事的词,它们将当时重大的历史如实记录下来,让词发挥着“史”的功用。

在南宋黄裳读柳永《乐章集》,认为柳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7](卷 35),指出柳词与杜诗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这一观点在清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多数人认为词也如诗一样,可以反映社会习俗、时代风貌,在表现题材方面完全可以突破“花间”“尊前”的模式,广泛地表现社会生活(过去、现在、未来)。长期以来词被视为小道,乃是因为词的题材(量)局限于“尊前惜别,花底谈心”,如果以现实生活入词就能达到突破词为小道的目的。近代闽籍著名词人谢章铤说:“窃谓自唐以来,词人日兴,而词量则犹未尽,夫曲为词之余,乃传奇诸作,佳者纪事言情,外可考世运之盛衰,内足验人物之邪正,而词反靡靡焉,即素讲宗派,亦止争格调声律之幽渺。古云诗史,岂词毫不足以充史耶,故曰未尽也。”^[8](卷 1)谢章铤身处乱世,耳闻目睹社会动荡不安,特别重视词对重大社会内容的表现。他说:“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填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偷减,则诗史之外,谓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夫词之称为乐府,乐府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9](卷 3)既然称之为“词史”,就必须具备“史”的基本特征,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看,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指它的“实录”精神。那么,清代词学的“词史”观是怎样体现史的“实录精神”呢?

第一,以史入词,即借词咏史,或写历史事件,或咏历史陈迹。如吴伟业是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在诗歌创作方面擅长歌行体纪事诗,在词的创作方面则是大量的以史入词。《古今词话》载王士禛语说:“娄东吴祭酒长短句,能驱使南北史,为体中独创。”如他的《满江红·白门》,咏叹金陵,实伤故国,感易代之悲,寄亡国之哀,可谓之词史。《梅村词》所附曹贞吉评语曰:“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再如他的《满江红·蒜山怀古》,由蒜山联想到王濬攻入建业,暗喻扬龙友于镇江抵御清军之事,描写清军占领下扬州的一片荒凉景象。《梅村词》所附邓汉仪评语曰:“其声悲激,其情危苦,正须渐离之筑,正平之鼓,雍门之琴,白江州之琵琶以和之。”曹贞吉也是清初能以史入词的一位有代表性的词人,他曾写有咏物词十首,分别咏隗嚣宫磁盃、灌婴庙瓦砚、延陵季子剑、朱碧山银槎、未央宫铜

套,表面上咏叹历史遗物,却寄寓着深沉的历史感慨,故王士禛称之为“咏一物而具兴废之感”。他的《百字令·咏史》五首也是一组咏叹伍子胥、高渐离、李广、诸葛亮、周瑜等历史人物的词,陈维崧认为可“置此等词于龙门(司马迁)列传、杜陵(杜甫)歌行”^[10](第103页),因为词中敢于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正因为清代创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咏史词,以“史”的标准来评鹭“当代”词人创作,便成为清代词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如陈维崧为任绳隗词集作序称:“然则斯词也,以为《金荃》之丽句,抑亦《梦华》之别录也。”^[11](卷5)读史惟圆《蝶庵词》的《沁园春》(漠漠尘途)阅后评曰:“磊落以取势,苍健以立格,如龙门(司马迁)作《伯夷列传》。”又读曹贞吉《珂雪词》中的《满庭芳·和锡坻李晋王墓作》阅后评曰:“每读《五代史》至《伶官传》,辄为涕下沾襟也。今于此词亦然。”

第二,以词纪事,以词的方式记叙时事,或以词的方式咏叹国事民生,或将自己的生平经历以词记之。如陶樾的《红豆树馆词》五六卷,“举生平境遇,自系以词,寓编年纪事于协律中”,即以词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生平履历。特别是他的《百字令》(刀光如雪),记载了陈爽、陈文魁潜入宫中事,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二云:“时宗伯(陶樾)以编修在文颖馆编校《全唐文》,贼持刀入,供事倪大铨、苏涛、戴杰暨茶房李得均被子戕,家人骆升徒手格斗,贼砍其五指去。仁宗方狩木兰,仓猝间禁兵未集,宣宗留守大内,发枪毙贼,贼始惊。又值雷雨交作,遂遁。巨魁旋即授首。宗伯词作于道光中,故有‘当今天授’句。昔人称少陵韵语为诗史,此词正可作词史读也。”这里所说的“此词正可作词史读”,正是指陶樾的词如实地记录了历史上发生的惊人一幕。不过,这只是以词纪事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指它对国破家亡等家国大事的再现。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清初词的创作里,当时人们身经明清易代,亲历清兵大肆屠杀无辜的悲惨场面,沉重地感受着亡国的悲哀和受外族凌辱的伤痛,中国古代重实录的“诗史”传统再次得到崇扬。这不仅仅是思想上或理论上的自觉,更是当时诗词创作的具体表现,如吴伟业的歌行体纪事诗便以其反映了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成为这一方面的典范。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称吴伟业:“所作《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思陵公主挽诗》诸什,铺张排比,如李龟年说开元、天宝遗事,皆可备一代诗史。”诗如此,词亦如此,如陈维崧的《八州甘声·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便反映了金声桓在南昌抗清失败的悲痛史实,《贺新郎·新安陈仲猷客蜀总戎幕,尝赎一俘妇……》借桓温西征灭蜀的历史来揭露清兵入侵蜀地时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残害的暴行。这一时期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史”的纪实性,真实地再现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历史和重大事件。

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主要是指其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动荡的社会现实,更指它充满忧国忧民、悲世悯时的深刻内涵,在清代人们也把那些反映社会问题有忧国忧民之情的词称为“词史”。如汪清冕《齐天乐》“劫灰堆里兵初洗”,写兵乱之后的破败荒凉,流露出深沉的历史感慨和乱世余哀,被谭献评为“浩劫茫茫,是为词史”。^[12](续编卷3)王宪成《扬州慢》“水国鱼盐”,写扬州的往日繁华与今日的冷落,反映了鸦片战争给扬州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也被谭献评为“鲑纲既坏,海氛又恶,杜诗韩笔,敛入倚声,足当词史”。^[12](卷4)还有张景祁的《秋霁·基隆秋感》,写法军侵占基隆,将士无所用命,作者希望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英雄为国建功立业,衬托出作者怀思念远的意绪,被谭献称为“笛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12](续编卷2)而那些在作品里如实再现社会现实的词人,也被人们称为“倚声家老杜”。如蒋春霖的《水云楼词》,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南京城的颓败和荒凉,谭献认为《水云楼词》是“清商变征之声”,“流别甚正,家数颇大”,蒋春霖也因之被谭献称之为:“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老杜。”^[12](卷5)特别是在内外交困的近代,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外国列强对我华夏虎视眈眈,这一时期的词坛涌现出不少表现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优秀词章。如周闲的《范湖草堂词》、黄仁的《姑射山房词》、周星誉的《东鸥草堂词》、许宗衡的《玉井山馆诗余》,有不少篇章直面现实,或控诉英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或遣责清朝统治者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或真实地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壮大声势及清兵将士的腐败无能^④。谢章铤评价这一时期的创作说:“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戾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已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

意。人既有心,词乃不朽,此亦倚声家未辟之奇也。”^[10](卷3)认为这一时期的创作在题材上有了重大的突破,或“导扬盛烈”,或“慨叹时艰”,开创了“词家未辟之奇”,以大量的极厚重的作品证明词体地位较前此任何时期有了较大的提高。

三

“史”的完整涵义应该包括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也应该包括民族情感发展史、文化心态史等精神文化的层面。而诗词记录的恰好就是传统的史学观念所无法包括的一代士人的心路历程,是正史所不载的文化心态史。“诗史”或“词史”的深层内涵可理解为“史外传心之史”,所谓“史外传心之史”,不只是指用客观写实的笔法记录下社会现实中发生的具体事件和经历,以弥补正统的历史著作所带来的缺漏,成为后人修史时可资考据的史料;它是指通过个体心灵真实感受体验的表现,所反映出的一代兴亡盛衰的历史,它不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史、政治史,而更应该是心灵史、情感史^⑤。

周济所说的“诗有史,词亦有史”,正是指诗词中反映的士人心态史(心灵史或情感史),是指个体心灵真实感受体验的表现所展现的历史。《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

这里,“绸缪未雨”语出《诗·豳风·鸛鸣》,“太息厝薪”语出贾谊《新书·数宁》,是暗喻应预防世乱与挽救危亡的。“已溺已饥”语出《孟子·离娄下》,指拯民于水火之中;“独清独醒”语出《楚辞·渔父》,指坚持清正的操守,不被浊世所污染。这些话都是与时代盛衰相关的,周济强调“感慨所寄,不过盛衰”,便是要求人们通过词去洞悉作者与有关国事民生相关的“性情、学问、境地”。周济的“词史说”是在嘉庆十七年(1812)提出来的,在《词辨》里还未能充分展示出来,到道光年间他编选《宋四家词选》评论唐宋词,便极为重视唐宋词中作者与国事民生有关的社会内容。如称王沂孙《齐天乐》(“蝉”)表现了“家国之恨”,辛弃疾《贺新郎》(赋琵琶)则表现了“谪逐正人,以致离乱”的内容,抒写了作者对当政者“晏安江沱,不复北望”的感慨。

而要理解周济“词史说”的深层内涵,必须追溯到它的理论源头——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在《词选序》中张惠言倡导“意内言外”,要求词与“诗、赋同类而讽颂之”,认为唐宋词中皆蕴含着“微言大义”。他的弟子金应珪《词选后序》进而指出,诗词两种文体异体同源:“乐府既衰,填词斯作……然乃琼楼玉宇,天子识其忠言;斜阳烟柳,寿皇指为怨曲。造口之壁,比之诗史;太学之咏,传其主文。”说明词中寄托如同诗中“比兴”,有寄托之词可比之“诗史”,蕴含着“主文谲谏”之义。在清代政治高压的环境下,人们是无法在诗词中直抒性情的,往往借助比兴寄托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隐微曲衷,这就是清代词学比兴寄托说在近代广为流行的社会背景。詹安泰先生说:“能于寄托中以求真情意,则词可当史读。何则?作者之性情、品格、学问、身世、以及其时之社会情况,有非他种史料所得明言者,反可于词中得之也。”^[13](第125页)指出有寄托之词,映射着人的性情、学问及品格,是人的心态的真实写照。

一部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文人心态史,一部清词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清代词人的心态史。詹安泰先生说:“盖我国士夫,素以词为末技小道,其或情意不能自遏,不敢宣诸诗文,每于词中发泄之。此种不容不言而又不可明言之情意,最为真实,其人之真性情、真品格,胥可于是观之焉。”^[13](第126页)那么,清词展示了清代词人的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这里特地拈出清初词进行具体分析。在清初人们身经明清鼎革的社会大变动,改朝换代的痛苦及不甘屈服异族统治的民族情结盘亘于心中,始终无法消解,遂托之于词。杨凤包《书南山草堂遗集》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其旧国旧君之感。”具体地说,这种“旧国旧君之感”又因为作者的身分及经历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一部分人始终坚守民族气节而于词中写亡国的悲哀,一部分人出仕新朝却又后悔不已,故于词中多表现其痛悔失节

的贰臣心态

代表前一种情况的是一大批遗民词人,如王夫之、屈大均、金堡、徐石麟等。在清军进入湘中后,王夫之曾组织义兵抗清,后依附于当时在肇庆的桂王永历政权,当复国的希望落空后便隐居衡山。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说:“(船山)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穷山,四十余年,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思,生死不忘。”他的《金人捧露盘·和曾纯甫春晚感旧韵》、《绮罗香》《青玉案·忆旧》,便是有寄托之词,或咏景、或叹事、或咏物,皆于隐约中表露了他对桂王的伤悼之情。屈大均为明末诸生,在清兵陷广州时,参加了陈邦彦、陈子壮组织的反清起义,失败后辗转至肇庆。后时释时儒,或游或隐,尝远涉秦、赵、燕、代,慨然有复兴明室之志,所至均写有痛哭明帝或伤悼故国的词章。他的长调《念奴娇·秣陵吊古》及短调《梦江南》《木兰花慢》,或吊古伤今,或咏物寄怀,皆深托故国之思和伤悼之情,故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后》称屈大均为“愁绝庾兰成”,他的《道援堂词》抒写的是“江南哀怨”。

代表后一种情况的可以宋征舆、龚鼎孳、吴伟业为代表,他们在明末就是才华出众的诗人或词人,却走着和矢志抗清故友完全相反的道路,入仕清廷后也大多是历经宦海风波,故而愤懑中有不平之气,伤感中有痛悔之心。如吴伟业少年得志,才华横溢,深得崇祯皇帝恩宠。入清后因陈之遴、陈名夏的举荐而出仕新朝,但不久即结束三年左右的再仕生涯,多次在作品中表达自己为世所累、不能以身殉国的愧疚心态。他的《贺新郎·病中有感》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上阕以“天年竟夭,高名难没”的龚胜做对照,表达了对自己不能慷慨赴死的痛恨之情;下阕赞死者的奇节,愧生者的偷活,深感自己名节既亏,一钱不值。再进一步说明,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极端痛苦,即使是用“艾灸眉头瓜喷鼻”的奇妙疗法,也无法排解自己失节的过错。最后,赞人责己,对自己的失节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这个角度讲,这首词可以说是一首至情之作^⑥。吴伟业能从仕途中及时抽身而出,而大多数仕清的江南文人却是在官场上备受挫折,或贬或迁的经历加深了他们对清朝统治的认识,在他们的作品里也明显地流露出怨愤及自伤自悼的情思。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康熙四年(1664)的湖上倡和词里,是年曹尔堪、宋琬、王士禛三位仕清文人都刚从狱室里释放出来,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使他们相遇于西湖,湖上的美景和压抑的心绪绾结起来,便在三人间形成共鸣,于是有了这次《满江红》调的湖上倡和活动。徐士俊《江村倡和词序》称:“盖三先生胸中各抱怀思,互相感叹,不托诸诗,而一一寓之于词,岂非以诗之谨严,反多豪放,词之妍秀,有足耐寻幽者乎?”这种“足耐寻幽者”就是“揅和着余悸和庆幸,隐寄以怨愤和颓伤,表现尘世的勘透,但求于山水中颐养劫后余生”^[14](第48页)。

四

一种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创作前提,清代词学从“词史”意识的出现到“词史”说的提出也是有其具体的理论背景的,这就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第一,清代词学话语是借鉴了清代诗学话语的,词学中的“词史”说正是诗学中“诗史”说的移用。清初特定的社会背景,为“诗史说”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温床,清初的诗人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归庄、杜浚都是“诗史”说的倡导者,他们要求诗歌创作反映民生疾苦和暴露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清代词学正是在“诗史说”的启发下而提出“词史说”的,如尤侗说“诗既有史,词独无史乎哉”,周济说“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丁绍仪说“昔人称少陵韵语为诗史,此词正可作词史读也”,他们都是联系“诗史”而讲“词史”的,因而在“词史”和“诗史”的审美内涵之间划上了等号。

第二,推尊词体是清代词学对传统词学的一大贡献,而“词史”观念的提出是和尊体说联系在一起。在宋明时期词是被视为小道末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词的表现题材仅仅局限于“花间”“尊前”的男欢女爱。谢章铤说:“词之兴也,大抵由于尊前花间、花底谈心,情事多褻近,数传而后,俯仰激昂,时有寄托,然而其量未尽也。故赵宋一代作者,苏、辛之派不及姜、史,姜、史之派不及晏、秦,此固正变之推未穷,而亦以填词为小道,若其量之只宜其此者。”^[18](卷1)如果拓展词的表现内容,将历史、现实大量闖入词中,

就能转变词“小道”“末技”的地位,而“词史”说的提出正是从内容题材的拓展方面对尊体意图的强有力回应

注 释:

- ① 近年论述“诗史”的代表性文章有:王德明《中国古代的“诗史”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韩经太《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陈望衡《“诗史”辨析》,《东方丛刊》1998年第4期。
- ② 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第四章第一节,齐鲁书社1993年版。
- ③ 笔者的有关论著亦涉及“词史”问题,如《清代诗学》第九章第三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④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一章第三节“鸦片战争前后的爱国词”有较为详尽的论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⑤ 参见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第2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⑥ 参见艾治平《论清初词的民族情结》的有关分析,《清词论丛》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参 考 文 献]

[1] 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 朱彝尊.乐府雅词跋[A].曝书亭集[M].四部备要本.

[3] 陈维崧.今词苑序(又名《词选序》)[A].迦陵文集[M].四部丛刊本.

[4] 钱谦益.胡致果诗序[A].有学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 王昶.明词综序[A].春融堂集[Z].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屋刊本.

[6] 汪泰陵.清词选注前言[A].清词选注[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7] 黄裳.书乐章集后[A].演山集[M].四库全书本.

[8] 谢章铤.眠琴小筑词序[A].赌棋山庄文集[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

[9]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M].词话丛编本.

[10] 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93.

[11] 陈维崧.任植斋词序[A].迦陵文集[M].四部丛刊本.

[12] 谭献.篋中词(又名《清词一千首》)[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13] 詹安泰.论寄托[A].詹安泰词学论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4] 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何良昊)

Consciousness of CISHI in Qing Dynasty

CHEN Shui-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Shui-yun(1964-), male, Doctor, Lecturer, Chinese Departm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GIXue(词学) of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ISHI is a contribution of CIXUE in Qing dynasty, have a prove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CISHI consciousness to the theory of CISHI. The meaning of the theory contains preserving the history by CI, or bringing historic into CI, or behaving the history of feeling besides the historic fact. The background of this theory is the popularity of the theory of SHISHI of the poetry and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CI of CIXUE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preserving the history by CI; bringing historic into CI; behaving the history of feeling besides the historic fact